



未名社科·媒介与社会丛书（翻译版）

Die Schweigespirale

Öffentliche Meinung—unsere soziale Haut

沉默的螺旋

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

〔德〕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 著 董璐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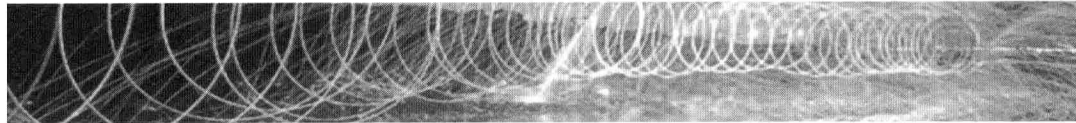


Die Schweigespirale

Öffentliche Meinung—unsere soziale Haut

沉默的螺旋

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



[德] 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 著 董璐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9-11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德)诺尔-诺依曼(Neumann, E. N.)著;
董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2

(未名社科·媒介与社会丛书:翻译版)

ISBN 978-7-301-20034-6

I. ①沉… II. ①诺… ②董… III. ①舆论—传播学—文集 IV. ①G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81185号

Title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Die Schweigespirale: Öffentliche Meinung-unsere soziale Haut
Autour: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 2001 by LangenMüller in der F. A. Herbig Verlagsbuchhandlung GmbH, Münche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a grant from the Goethe-Institut which is funded by the Germ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书 名: 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

著作责任者: [德]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 著 董璐 译

责任编辑: 谢佳丽(xiejiali.com@hotmail.com)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034-6/G·329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未名社科—北大图书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1.5印张 311千字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总 序

媒介是神奇的，社会也是神奇的，媒介与社会的耦合生产出无限的神奇。从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关于“社会”与唤起社会意识的符号与仪式共生的理论来看，媒介使社会显得神奇的过程也造就了自身的神奇。

人类在现代大众传播成为现实之前对于“神奇”的感知是经由巫师及其巫术的转化来实现的。澳洲土著在图腾舞蹈的狂热中感受到超个人的社会力量的存在。满身披挂的萨满用舞蹈和神歌请灵降神，让已经消逝的显露原形，让凡人通常不可见的显现真身，让千山万水之遥的即刻大驾光临。借助巫术，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可以暂时克服，过去的、未来的都可以在现实中出现，墓室中的、仙山上的都可以召唤到面前。

这些神奇经验在现当代越来越彻底地被大众媒介所造就，电视、网络等图像传输技术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大人物像变戏法一样总跑到百姓居室内高谈阔论，历史的亡灵在荧屏上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媒介使常人具有千里眼、顺风耳，看见那原本遥不可见的，听清那从前根本就听不到的。媒介是神奇的，它在社会中的运行有如巫术。几百年的现代化对世界“祛魅”，结果我们看到人类社会所集聚的全部的“魅”都汇聚于媒介，并被媒介无限放大。

长期耳濡目染，媒介的神奇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就像前现代的人对巫术习以为常一样。但是，这个过程一直都是知识界探讨的课题。现代大众媒介的各种新形式从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会被知识界作为新事物加以关注。从较早的照相、无线电广播到电影、电视，再到近年的新媒介传播，关于大众传媒研究、文化研究、虚拟社会研究的知识生产就一直紧随媒介发展的步伐。媒介研究在发达国家已经形成庞大的群体和细密的分工，这个群体既能够追逐传播领域的新事物，也能够通过专业的眼光让人们习以为常的许多方面显出怪异来，从而引发众人的注意和分析的兴趣。我们国内的媒介研究在这两个方向上都需要培育自己的能力。

依靠现代大众媒介运行的社会是一种机制极其不同的社会，中国社会正在越来越深地涉入其中。

高科技媒介的威力以不断增强的方式发挥出来，世界虽然还成为不了地球村，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方式、人与各种层次的共同体的联结机制都发生着变化。

社会因媒介成为可能，因新媒介而成为新的可能。社会是个人之间相互挂念、相互意识到而成为可能的。在短暂的一天和有限的一生里，个人在多大范围里意识到多少他人的存在、记挂多大范围的他人，这是靠媒介运作的结果。基于集体意识和共同想象而形成内在联系的社会，是存在于媒介(运作)中的。在中国境外的许多城市，华人移民在本地新闻中看到唐人街的春节表演而确证自己与华人群体的认同，全世界的中国人因为春节文化的展演而想象自己属于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共同体。网络新媒介创造了新的人际联系方式，虚拟社区借助新媒介产生出来，人们之间隔空互动，与传统真实意义上的面对面交流的主要差别只是不能“臭味相投”而已。

媒介见证社会实体的存在。人类共同体因为联合国的新闻、国际救灾行动的画面而被呈现；国家共同体因为制造媒介事件的奇观(spectacle)而被世人记住；地方共同体因为地方风物、特产或节庆被传播而知名；行业罢工、同性恋群体因为游行的极端表演而受注意。优势的存在是在媒介中具有正面形象的实体。

媒介见证社会力量的博弈。各种社会力量要竞争，最好的方式是围绕媒介、借助媒介展开能见度高的竞争，展开正面形象的竞争。国际政治的软实力、国内政治的亲民形象、商业竞争的名牌效应、文体明星的商业价值……都是靠媒介的舞台定位的。社会力量竞争的王牌是通过媒介制造“奇观”，造成举世瞩目的效果。制造“9·11”事件的组织选择纽约世贸大厦为目标，是因为他们不仅要使行动成为媒介事件，而且还要使媒介事件具有奇观效应(spectacularity)；美国占领伊拉克，对媒介画面进行筛选，突出精确打击的画面，限制伊拉克平民死伤的画面，既在避免负面效果，也在凸现战争奇观。强势的社会力量是媒介中的主动力量。

媒介毕竟是社会的媒介，媒介为社会中的人所运用。人具有神性和魔性。社会既是温情的港湾，也是邪恶的渊藪；社会既以公正相标榜，也以不平等为现实。运行于社会中的媒介也兼具人性和社会的两副面孔。媒介制造人间奇迹：新闻报道能够让尼克松总统下台，能够让孙志刚事件

改变弊端连连的城市收容制度,能够让绝望中的重症患者借助社会力量得到救治……媒介也产生遗憾和问题,媒介暴力、媒介色情、媒介偏见一直层出不穷。

媒介是社会的舞台、社会的缩影,媒介本身就是社会。媒介被政党看作一个特殊的战线,一个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域。主导的力量会设法控制公共舆论的导向和社会议题的设置,其他的社会力量或附和、追随,或批评、抵制。弱者有弱者的媒介武器和媒介阐释策略。沉默或参与,是一次选择。参与而主动解码,借题发挥,进而用反讽来消遣权势,则潜藏着无数持续的选择。大众媒介在社会的运行中产生着层出不穷的问题。

媒介不仅是信息、思想、政治,也是经济。从事媒介行业的人也是经济动物,媒介也是经济利益的集散地。媒介造就百万富翁、亿万富翁,造就中产阶级,造就报童、报摊,当然也造就自己的消费者群体。这是一个不断膨胀的产业。新媒介成为新的产业,往往使原有的一切产业具备新的形式和运作机制。媒介产业是其他产业发展的助推器。世界是人的天地,也是产品的库房。产品世界的秩序是由媒介按照品牌进行编码和排列的,从而形成“物的体系”,以此支撑着人的世界成为一个多样而有序的“消费社会”。

媒介是一种信息产业,是一个经济领域的范畴。媒介又是现代文化,因此媒介作为经济就应该更加准确地被称为文化经济(文化工业)。媒介卷入的是共同体集体利益和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地位、声望的分配问题,因此媒介涉及的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社会博弈过程中消长,媒介成为社会进步的助力,有时也为社会制造解决问题的障碍。媒介与社会,纠结着人类伟大的成就和太多的问题。凡此种种,我们就让有心人、术业有专攻的人去一一论说其中的究竟吧。

是为序。

高丙中、杨伯澍

2007年8月,北京大学

译者序

“这是一篇工作坊报告”，作者在本书的“1991年后记”中这样写道。作为在过去近两年时间里一直沉浸其中，一直追随着诺依曼在纵横交错的历史和枝蔓相联的各种学科间探索有关沉默的螺旋的译者，我认为这句话精练地概括出这是一本什么书。这不仅是一本讲述了重要传播概念的理论书，也是一本一步一步地引导人们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书，并且在研究总体思路上给予了指导，因此，这也是一本关于方法论和方法学的书。

沉默的螺旋理论对于传播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者、学习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理论，人们往往可以用百字左右的语言和那幅著名的由螺旋与箭头构成的简图对它进行描述，那么诺依曼为什么要用德语写了400页呢？

诺依曼是从多个学科角度论述沉默的螺旋的形成原因及其表现的，其中涉及心理学（如米尔格兰姆的实验、奥许的实验等）、社会学（如斯宾塞的“社会控制”、卢曼的《公众舆论》等）、人类学（如特恩布尔的“非洲部落和太平洋部落中的舆论”、米德的《原始人群中的公共舆论机制》等）、社会心理学（如塔尔德的“模仿律”、高夫的嘲笑研究等）、政治学（如休谟和麦迪逊的“统治是以舆论为基础的”、卢梭的“公共意见”、托克维尔的“舆论作为暴政”等）、法学（如洛克将法律分为三种类型、戴西的《19世纪英国法律与公共舆论的关系》等）、哲学（如黑格尔对公众舆论的观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柏拉图的“不成文的法律”、蒙田的《尝试集》等）、新闻学（如李普曼的《公众舆论》等）、宗教（如马丁·路德和闵采尔面对舆论的不同方式等）、社会哲学（如格兰威尔的“意见气候”等）、传播学（如勒温的“守门人”等）、行为学（如劳伦斯的《所谓的坏人》、戈夫曼的《公共场合的行为》等），甚至是动物学研究（如齐门的《狼》、乌克斯魁尔等对穴鸟的研究等）和文学作品分析（如拉克洛的《危险的关系》、荷马的《伊利亚特》等）。其中的目的，是正如她在书中所提到的：“从所有的角度观察公共舆

论的现象。”因此，她的“报告有些跳跃……并不是按时间顺序的”。

而且，她所考证的时段从公元前一直到 20 世纪末。这样的上下求索，找寻“舆论”这个概念从第一次出现的时间和之后的演变过程以及其后出现的场合，在作者看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为了了解公共舆论的含义，重要的就是弄清楚这个概念首先是如何产生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通过哪些观察而得出的。这就像我们要更多地了解某种植物，一定会去研究它的生长一样”。

而这些研究思路对我们应该具有非凡的启迪意义。

社会科学的对象是围绕着人展开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主观性、复杂性，使得研究的过程“横看成岭侧成峰”，不仅没有一条直达之路，而且途中有着众多令人困惑的岔口，让研究者“如同在迷雾中前行”。《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这本书恰又是在探寻“人类和人类社会永恒的特性”，这是对一个极其本质而又非常微妙复杂问题的探索，也因而可以作为我们展开社会科学研究的完美典范。诺依曼在这项对人类的社会本性的研究中采用了二手资料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实验法、民意测验法、量表法、内容分析法、影像分析法等多种调查研究工具。

这些方法也都是在教科书上用几百字就可以概述的，但是实验的刺激如何设计、问卷调查问什么、内容分析的对象有哪些，却必须是以对研究课题不断深入的理解和通过大量研究实践而积累的深厚的研究经验为基础的。而且因为研究的对象是人的行为和背后的动机、态度及实质，因此显而易见不可能通过若干直接发问而得到答案。比如在探查人们对被孤立的恐惧时，如果开门见山地问人们“您害怕被孤立吗”，显然如同缘木求鱼，因此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还需要严格而又有创新的设计。例如，诺依曼和她的同事们设计了“坐火车测试”，提出了多个具体问题或模拟了一些现实情境，或观察米尔格兰姆所提出的用作孤立威胁的声音符号，如嘲笑或嘘声等，从而努力将不可见的现象变得清晰可见、可以观察。

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无法轻易实现。

对此，诺依曼首先将复杂的理论假设先分解为若干独立、具体的子假设，然后再通过对概念的操作化定义确定可测的、关于所研究事物的特征的指标。

在研究的过程中，作者还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研究方法在这项研究中的作用和局限，例如实验室实验和实地实验的优缺点、民意调查在研究沉默的螺旋中的局限性以及问卷调查在研究舆论上的不适合性等。她的研

究团队通过对实验中实验组和控制组的设计,设置多重实验情境,对多种人群(包括记者)进行问卷调查,设计不同于传统问卷调查的问题,用内容分析法对相关图书进行研究,对大众传媒中的图像符号语言展开解码,进行富有特色的自我实验;并且通过对几十年纵贯研究结果的追踪和对比,来尽可能地规避每种方法的局限性;通过三角测量,完成多种方法对结论的相互验证。

而在所有方法的使用和对调查研究过程的设计中,诺依曼的焦点都一直集中在个体的社会性本质上,从而使得研究过程虽然曲折但直指目标。对此,她指出“通过使用某些工具或测量手段所得出的结果,在这里显然被人们等同于研究对象了,而不是只把它当作进一步理解公共舆论的资料……”这对我们在开展研究工作时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提醒。

因此,这本书也详细地向我们展示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如何在满足科学研究的可重复性和可检验性以及独立于观察者主观印象的要求下,测量这些过程”。

所以,这本书是一篇工作坊报告,我们在更深刻而全面地理解舆论和沉默的螺旋,并在把握其背后的人类社会性本质的同时,也从作者多维度、多层次、多种方法的研究中,体验假设、探寻和论证这样充满新奇的学术之旅的乐趣。

最后,感谢周丽锦编辑、谢佳丽编辑和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愉快的研究过程,以及冯晓春先生在翻译工作中的大量帮助。

董璐博士

2012年冬于国际关系学院

2001 版前言

“如果图书真的是人类记忆的集中体现，”德语文学专家沃尔夫冈·福瑞瓦尔德(Wolfgang Frühwald)在1999年12月写道：“那么在对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作品与这个世纪末的作品进行比较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在80年代的作品中充斥着世界末日和大量的大难临头的情节。而现在，一个世纪将要结束时，我们读到、看到、听到的都是拯救的故事。”一个月之后，2000年1月，我为《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写的新年文章用了这样的标题——《诺亚方舟的世纪》(*Das Jahrhundert der Arche Noah*)，但是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我才突然意识到：诺亚方舟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象征着拯救。

2001年发生了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件——丹尼斯·提托(Dennis Tito)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太空游客。这位美国的大富豪为这次为期一周的前往国际空间站的旅行支付了巨额费用，目的是为了体验在太空中的生活。

有关太空中的生活，早在1954年的时候，《阿伦斯巴赫档案》(*Allensbach Archiv*)中就涉及了关于这个话题的问题：“您认为，在其他的星球上也有人或其他有思想的生命吗，或者您认为我们人类是宇宙中唯一的会思考的物种吗？”那个时候有42%的人认为：“当然，还有其他的有思想的物种。”只有1/3的民众表示地球上的人类是宇宙中独特的生命体。在2000年当这个问题被重提的时候，人们的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只有23%的人相信“宇宙中还有其他的类人的生命”；而43%的人指出：“我们是唯一的。”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消息报道说，有很多人希望去那个红色的行星——火星上看一看。我们人类已经准备好了离开地球吗？

关于宇宙中生命的问题，从20世纪中期对不明飞行物(UFO)的介绍开始，就被不断地提起，多数时候人们由此产生受威胁感。一些文章报道了那些目击者的经历，比如夜里不明生命体走进了他们的卧室，并且将

他们绑架。几年前,美国著名高校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约翰·E. 马克(John E. Mack)就因为撰写有关灵异和外星人绑架方面的报告而享有一定的名望。他的基本思路是,外星人的这些行为是在试图警告人类地球要毁灭了,或是努力帮助人类在灾难后存活下来。而在这个时候,许多国家都竞相建造海底旅馆,并且将它们作为独特蜜月的新选择。也许这意味着当有一天陆地不再适合居住时,人类从此要生活在海底?也许在时代领潮者跳跃式的表达中,已经大跨度地连接了世界末日的降临和救赎方式的浮现。

那么,什么样的桥梁可以通往“沉默的螺旋”呢?

“沉默的螺旋”是一个包含了两重人性的学说:一方面是指我们的个性本质,而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人的社会性本质,而在这方面我们直到今天都不愿加以认识。因为,“随大流”是一个贬义词。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①敏锐地体察到这一方面,凭着直觉捕捉了人类的社会性本质。科学家中真正的创新者对人类的两方面特性都有体验,因为在知识进步中的探险正如同迷雾中的前行,并且不断地被忽略或被嘲笑。我们可以想想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1863—1931)和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当乔治·赫伯特·米德在一次大会上发表了他的观点后,他震惊于同事们的冰冷反应,而他之后从未就这个观点再写过论文或著作。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米德的经典著作《心灵、自我与社会》(*Mind, Self and Society*)则是他的芝加哥大学的学生根据课堂笔记整理完成的。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教授的欧文·戈夫曼则是更换了所任教的高等院校,也更换了他的科研题目。他的全部雄心抱负都在于获得同事们的承认,直到最后他当选为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并且在此后的第二年——他60岁的时候去世了。

但是即便今天当我们站在“人类的社会性本质”这一研究分支的起点上的时候,我们也无法像在私家花园里随心所欲地散步那样,完全独占这个研究题目。我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美国著名传播学教授珀西·唐纳鲍姆(Percy Tannenbaum)的

^① 约翰·洛克(1632—1704),他与大卫·休谟、乔治·贝克莱在知识论上被列为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后代政治哲学的发展,被认作是启蒙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自由主义者,其理论被反映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译者注

一次谈话。我向他讲述了我们在德国美因茨大学新的研究成果，并且提到了人们的社会性本质。“人类的社会性本质……”珀西·唐纳鲍姆重复道，然后他问：“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在新的世纪，未来对我们人类意味着什么？人们可以假设，今后从经验社会学中发展出来的分支会为我们带来很大的进步。人们也可以希望，这些知识和以前所发展出来的知识，如实用物理学、化学和医学一样对我们人类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政治家们、立法者们、法官们对人类错误的假定——由于缺乏对人们社会性本质的认识，而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从而给每个个体和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危害。

正是社会科学的知识所起的作用，使得人们可以更好地与社会问题做斗争。例如从20世纪30年代初学者玛丽·雅霍达(Marie Jahoda)^①、保罗·F. 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②和汉斯·蔡塞尔(Hans Zeisel)共同完成的开创性著作《马林塔尔失业研究》(*Die Arbeitslosen von Marienthal*)开始，经过80年代中期的阿伦斯巴赫的研究项目，以及阿伦斯巴赫研究所后续进行的大量问卷调查，直至今天的有效验证，都是集中于失业问题的。在全球化的时代里，科学进步对世界的改变显然是远远大于从前的。

沉默的螺旋这个理论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在全球得以传播，以至到了今天《沉默的螺旋》这本书除德语版本之外，又不断出现英语、日语、韩语、中文、俄文、西班牙语、土耳其语和保加利亚语版本？

因为沉默的螺旋描写了人类和人类社会永恒的特性，它适合于任何人种，它描绘了在全球都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在当选后不久访问了日本，他问刚刚在大选中失利的日本首相：“什么地方出了偏差？”这个日本人回答道：“唉，你知道吗，沉默的螺旋对我们不利……”

显然广泛传播这一理论是重要的，而我从1978年在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就已经致力于这项工作了。因此，这本书于1980年在德国出版

① 玛丽·雅霍达(1907—2001)，英国社会心理学家，她的主要著作有《工作与失业》、《现代绝对精神健康的概念》、《人类关系研究方法》、《弗洛伊德和心理学的困境》等。——译者注

② 保罗·F. 拉扎斯菲尔德(1901—1975)，美国实证社会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的创办人，他的代表著作有《人们的选择》、《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思想》和《社会研究的语言》等。——译者注

后仅四年，即1984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这本书的英语版本。

在芝加哥我发现，沉默的螺旋是一个随处可见的现象。我记得去看姜·卡罗·梅诺帝(Gian Carlo Menotti)^①所作曲的芭蕾舞表演，那是一个星期天在海德公园第59街道国际厅的演出。芝加哥大学美国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克莉丝·米勒(Chris Miller)和我谈起这个演出，她是在每日的会话课上——我为了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而参加的——遇到我的。她和一位朋友一起排练过这出芭蕾舞剧，此外她还参加了该剧的合唱，并且担任其中一位舞者的角色。这部剧要上演，我自然要去看。那是1980年的早春，是我第二次去芝加哥大学做政治学的访问学者。

直到在我看演出之前，我并没有想到这部芭蕾舞剧居然就是舆论的经典体现。而且的确如此，甚至更淋漓尽致。日后大学生报纸《芝加哥放逐者》(Chicago Maroon)评论了这场演出，一位评论者写道，观看演出时，他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我不得不承认，我也是如此。但是我应该先讲述这个芭蕾舞剧的故事情节，以便让读者们知道我的想法。

在意大利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小城镇，那里居住着忠厚诚恳的老百姓、伯爵及伯爵夫人，他们世代都居住在那里。而在城镇外山上的古堡里住着一个古怪的人，他常常做出让城镇居民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这些出格的想法和做法令城里人生气，因而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与这个怪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一个星期天，这个怪人出现在城里，赶着一头独角兽。人们看到后，纷纷对他摇头。过了一会儿，人们又看到伯爵和伯爵夫人，他们也赶着一头独角兽。这却成了一个信号，那就是全城的人都应该有一头独角兽。

之后的又一个星期天，古堡里的那个怪人突然和一个蛇发女怪出现在城里。人们问他，他把独角兽放在哪里了。他说，很遗憾，他把独角兽抹上胡椒粉给烤了。所有的人都被吓坏了。而当伯爵和伯爵夫人也带着蛇发女怪出现的时候，这种行为又成了潮流并迅速地流传开来，那些能够拥有蛇发女怪的人都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

到了第三个星期天，这个古堡里来的特别的人又带着人头狮身龙尾的怪兽出现了，并且告诉众人，蛇发女怪被杀掉了。这又让公众很反感。但是和以前一样，当伯爵和伯爵夫人也偷偷地将蛇发女怪处理掉之后，人头狮身龙尾的怪兽又成为最大的时尚了。

① 姜·卡罗·梅诺帝(1911—2007)，意大利裔美国作曲家。——译者注

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古堡里的怪人再没有出现。人们一致猜测，人头狮身龙尾兽也要被怪人杀掉了。于是，他们组织了市民行动，以终止古堡中的屠杀。人们向古堡进发。当他们冲进古堡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吓住了，他们看到那个怪人躺在地上即将死去，而旁边围坐着三只动物——独角兽、蛇发女怪和人头狮身龙尾怪兽，这三只动物陪伴着那个怪人。独角兽是他年轻时的梦想，蛇发女怪代表着他的中年，而人头狮身龙尾怪兽是他的老年。城里来的人明白了他的想法，并且很快让这种情结成为流行的模式。对于古堡中的那个怪人来说，这三个动物是他生命中的核心。姜·卡罗·梅诺帝将这部芭蕾舞剧起名为《独角兽、蛇发女怪和人头狮身龙尾怪兽，或一位诗人的三个星期天》。我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这部芭蕾舞剧也可以叫作“公众舆论”。

我们先站在芭蕾舞剧中诗人的这一边来分析。就连《芝加哥放逐者》的批评家也为之落泪了。这位诗人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是一个强大、独立、有思想，并且被自己想象的图景所引导的人。而伯爵和伯爵夫人尽管人们没有意识到，但他们是肤浅却重要的人物，他们没有自己的想法，却无处不在地引领潮流。我们尤其厌恶那些愚蠢的人，也就是那些随大流的、竞相模仿的人，他们先是嘲笑那些跟自己不同的人，然后又争相跟随每一个潮流，而最后却要摆出道德上的优越感。所有特立独行的人，无论是艺术家还是科学家，在任何时候都能感受到上面所描写的境况。

现在我要站在伯爵和伯爵夫人，以及城里居民的立场上了。我说过，我们厌恶我们的社会性本质。我们从不愿意考虑，当生活在一个群体里，我们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保证这个共同体的聚拢。我们似乎一直对此做足了工作，以拥有用历史和文化维系的共同体，以及通过法律保护的机构，似乎这些都不是通过不断的不断调试而形成的。但是，其实是生活中的“顺从”使社会保持行为能力和决策能力。

约翰·洛克谈到了来自意见、名望、时尚中的规则，这些要比任何一条宗教戒律或国家法规更为个人所遵循，因为违反流行的行为模式，人们会立即遭到报复，马上会失去来自周围环境的认可和承认。但是，为什么过去的百年间很少有人关注这种在社会生活中如此至关重要的行为；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所有人都将那些与时尚有关的行为冠以负面的字词：狂热、

时髦狂、盲从、Schicki-Micki^①。带着独角兽、蛇发女妖、人头狮身龙尾怪兽散步，只是时髦流行罢了。

今天已经证明了，即便人们清楚地看到某件事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会让自己陷入孤立的话，那么人们就会陷入沉默；相反，所谓的舆论——那些人们可以公开表达而不至于使自己陷入孤立境地的想法和行为方式——则成为代表好品味和正确的道德观的普遍性的共识。

我站在伯爵和伯爵夫人的一边，因为没有他们，诗人的想法就不能广为传播。他们正是所谓的播报员：伯爵和伯爵夫人是社会中所不可缺少的意见领袖，他们接受了诗人、艺术家的独特想法，并且通过传媒、记者而进行广泛地散播。那么那些市民、跟随者、城镇居民呢？有关他们的感觉、他们的眼泪我们知道多少？有关他们内心想法的转变我们知道多少？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不愿意在公共场合被孤立起来。约翰·洛克支持，万人中我们也很难找到一个人，能毫无知觉地面对周围环境对其的蔑视。当没有人再带着独角兽散步的时候，怎么还会有人和独角兽走在一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社会完全由特立独行的人组成，每个人都是来自古堡的怪人。这时，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没有一个社会是由不具备社会性特质的人组成的，不被孤立所恐惧的社会是不存在的。我们可以对人类的社会性特质不表示同情，但是我们应该理解这种特性，这样才能不对跟随者有误解和敌意。

在芭蕾舞剧上演后的一天的课堂上，在讲述“舆论”的时候，我试着对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们分析芭蕾舞剧中的舆论。是否能够不带任何轻视的态度接受人类的社会性本质，可能因文化环境的差异而有不同：在日本人看来跟随众人的意见并不是弱点，因为他们在生活中更愿意细致深入地观察周围的环境；而阿伦斯巴赫舆论调查机构在对德国人的多年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大部分德国人都会说：“我并不在乎周围人的看法……”这是明确地表示对于人的社会性本质拒绝承认。

但是，总地来说，公众意见在生活中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点

^① Schicki-Micki 是指很在意潮流，只穿昂贵的名牌的衣服、鞋子，佩戴出自名家之手的闪亮的配饰的人。与之相对应的是德国人中的，尤其是年轻的高校学生中的“麦片族”，他们穿尽可能不显眼的衣服，如黑色、米色或褐色的棉制品衣服，不讲究装束的品牌，注重自然、简单。——译者注

超越了时代和地域的差异,在不同时空中都得以体现。

这本书于1980年首次在德国出版,其后的版本保留了第一版的绝大部分内容,只是补充了新的结论章节,以阐述研究中的新进展。

实际上,我不断地在书后增补的章节里提出新视角。逐渐地我们越来越清晰地发现,有些重要的观点藏在书中,没有得到更深入、透彻的分析。例如,关于舆论发挥影响的基本规则这部分。

有关舆论的界限这个问题在早期的版本中只是几笔带过。这个错误现在在新版本中的题为《2001年补遗》的增补章节中得以改正。这一章是我的朋友托马斯·彼得森(Thomas Petersen)撰写的,他与我合作完成过另一本书和许多文章。科学研究需要几代人共同完成;而每个人只能在他的有生之年在通往知识之路上完成小小的一段。

舆论和强权力量的作用在于解决冲突、支持政府,并且当个人有所违反的时候向他们施加压力,直到他们“被排挤出社会生活”;舆论的效力总是不断地在新的场合中被发现:无论是在《圣经》还是在《荷马史诗》的讲述中,或是在远古时代没有文字记载的法律条文里、神话故事里,以及尼伯龙根(Nibelungen)^①谚语中都可以找到。

这本书最重要的事情是去阐明舆论超出常规的力量。而当人们对这种力量有所理解后,就不会那么惧怕它了,人们也不再热衷于幻想自己是独立于舆论压力之外的“成熟”的人。而且,当人们遇到那些在不同场合下根据不同舆论而调整自己行为的人时,也不再会表现得那么高高在上了。

于博登湖畔的阿伦斯巴赫

2001年6月

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

① 《尼伯龙根之歌》是中世纪中高地德语的著名叙事诗,讲述的是古代勃艮第国王的故事。这个故事大约创作于公元791—792年,作者不详。故事取材于许多异教的故事题材和来自5世纪英雄的口头传说。后来这首叙事诗散佚,现在的版本是在大约1190—1200年间由某个奥地利作家重新编撰的,大体内容与原诗相同。《尼伯龙根之歌》被人们称为德语的《伊利亚特》,是体现日耳曼民族品格的伟大诗作。——译者注

目 录

第 1 章 提出沉默的螺旋假设	1
“我们所测量出来的远远多于我们所理解的” / 3	
每项研究都开始于一个谜 / 3	
谈论和沉默决定了意见气候 / 4	
最后一刻的跟风者 / 6	
真相显现 / 7	
第 2 章 用民意调查研究的工具进行检验	9
“我怎么能知道?” / 9	
发现人类的一项新能力:感觉意见气候的能力 / 11	
“坐火车测试” / 17	
模拟公共环境 / 19	
证明了第二个假设:有获胜保障的那一方滔滔不绝,而可能 失败的一方趋于沉默 / 23	
徽章也是一种表达 / 24	
愿意谈论的那一方所拥有的优势 / 25	
为了和时代精神保持一致,而默不做声 / 29	
将潮流的变化作为研究的机会 / 30	
有关革新派对意见气候的反应较弱的猜测被驳斥 / 31	
测量周围意见压力的新工具 / 34	
关于在公众场合意见表达意愿的一系列问题 / 36	
第 3 章 作为动机的孤立恐惧	38
所罗门·奥许的经典心理学实验室	
实验动摇了人类的正面形象 / 39	
模仿源于两种动机:学习和孤立恐惧 / 40	